

#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 ——基于城市化与镇化的二元视角

张慧慧 胡秋阳 张云<sup>1</sup>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区域间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化与城镇化并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快于城市化，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偏低。从省级层面来看，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由正相关逐渐转为负相关，反映出城市化与城镇化间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性表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其改善的时间节点在 2005 年前后。同时，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正向互动不断增强且与城市化的竞争关系逐步显现，导致城镇化与“两化”协调性间的关系渐趋负向。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应明确城市化与城镇化分工定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为城市化发展培育新动能。同时，打破行政化分割，促进区域间融合发展，推动国内大循环。

**【关键词】** 城市化 工业化 协调性 耦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2021)-04-0066(08)

### 一、引言

城市是现代产业和人口集聚发展的结果，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 60%，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依然表现得比较突出。<sup>[1,2]</sup>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城市化和城镇化是两个相近但不相同的概念和统计口径。在国务院 2008 年公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中，将统计区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城镇，另一类是乡村。其中的城镇又划分为城区和镇区。城区指的是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指的是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乡村指的则是在这种规定下城镇以外的区域。在此统计规定下，城市化指各类资源向城区的聚集，镇化指各类资源向镇区的聚集，城镇化则同时包括了这两部分。

在城镇化总体上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背景下，一方面，既有研究对于城镇化过程中优先发展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县镇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农民基数庞大，发展小城镇有助于降低人口迁移成本，实现快速城镇化。<sup>[3,4]</sup> 更多研究发现，只有大城市才能够发挥集聚效应，且离开大城市的带动，中小城镇的发展潜力有限。<sup>[5-7]</sup> 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向城市及其集群而非县镇，并多次强调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作用。

<sup>1</sup>**作者简介：**张慧慧，助理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胡秋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张云，副教授，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项目“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2021)；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借助企业国际合作创新动能，促进天津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ZB19500608)

与此同时，作为与城镇化密切互动的工业化，现有研究对二者的分析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城镇化的探究过于笼统，没有对城市化和镇化进行区分；二是对于城镇化的度量，基本集中于人口指标，缺乏其他层面的综合考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均围绕上述不足展开。首先，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城市化与人口镇化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分析，以明晰城市化和镇化各自的特点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其次，本文利用耦合模型重点测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及其协调关系，再进一步考察镇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两化”协调性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城市化与工业化间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且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城市化和镇化以及区域均衡发展政策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与镇化发展概况

如前所述，城市化和镇化是城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双方的演进格局并不一致，且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本文根据 1982 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及全国层面的镇区人口比重与城市人口比重，分别反映人口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水平，通过绘制图表呈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和互动关系。

### 1. 东部人口的“城化”与中西部人口的“镇化”

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全国及各大区域的城区和镇区人口占比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各区域间城市人口占比存在较大差异，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占比最高，但是其增速在 1990 年之后较低。东部城市人口占比虽然在初期与东北部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由于其增速较快，因此到 2015 年，东部城市人口占比与东北部差距显著缩小，2015 年东北地区城市人口占比为 44.3%，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占比为 42.2%。中部和西部城市人口占比较低，且二者间差距很小，增速低于东部地区，因此其城市人口占比与东部及东北地区存在较大差距。2015 年，中部和西部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 24.0%和 24.3%，全国城市人口占比为 32.7%。

如图 2 所示，2015 年镇区人口占比最高的是中部，为 26.8%，其次是西部以及东部，分别为 24.0%和 22.1%，东北地区的镇区人口占比则远低于其他三个区域，为 16.6%。1982~2015 年，中部、西部以及东部镇区人口占比均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且中部增速最快，在 2005 年实现了对西部和东部的反超。东北地区镇区人口虽然在初期较高，但增速缓慢，个别年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 2015 年其人口镇化水平远低于其他地区。

对比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各大区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化和镇化的侧重表现出明显差异。1982~2015 年，中部和西部镇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占比增幅约为 10%，而镇区人口占比增幅达到了 20%左右，显著高于城市人口占比增幅。东部城市化和镇化增幅则相对均衡，城市人口占比增幅为近 25%，镇区人口占比增幅为近 20%，城区和镇区人口均表现出较大幅度增长。东北地区则侧重于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比增幅约为 15%，镇区人口占比增幅约为 5%。因此，在 1982 年到 2015 年期间，中部和西部的人口主要表现为镇化，东部人口城市化和镇化同步进行，东北地区人口则主要表现为城市化，镇化发展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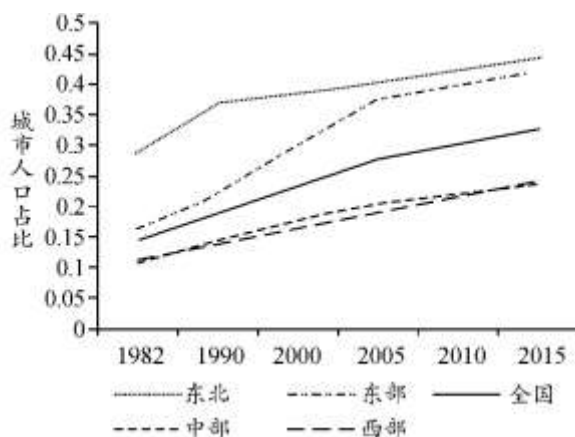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人口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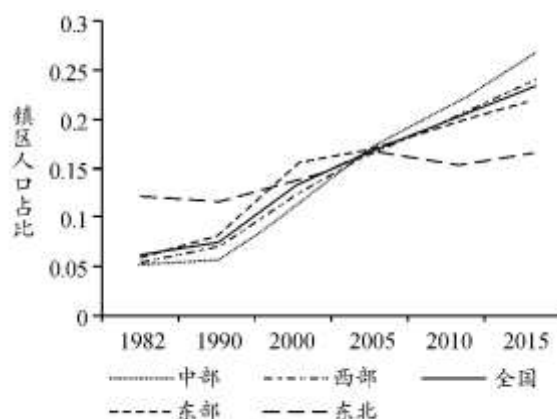


图 2 镇区人口占比

图 3 和图 4 分别展示了全国和四大区域的城镇人口占比和镇化指数。所谓镇化指数，指的是镇区人口占城区和镇区总人口的比重，以此来反映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镇化的占比。图 3 可以看作是图 1 和图 2 的综合结果，东北地区城镇人口占比起点很高，但是其增长速度较慢，因此后期被起点低但增速快的东部反超。2015 年东部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64.3%，东北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率为 61%。中部和西部人口城镇化几乎处于相同的起点，在 2000 年之前，两个地区城镇人口占比的增速也非常接近；2000 年以后，中部城镇人口占比增长略快于西部，2015 年中部人口城镇化率为 50.8%，西部人口城镇化率为 48.3%，全国人口城镇化率为 56.1%。

图 4 镇化指数的走势则进一步体现出中西部与东部及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别。可以发现，中部和西部的镇化指数在 2000 年以后远高于东部及东北地区，2005 年中部镇化指数超过西部，2015 年达到 52.7%，意味着中部城镇化人口中，超过一半都生活在镇区而非城区。西部 2015 年的镇化指数为 49.6%。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镇化指数相对较低，甚至在个别年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15 年东部镇化指数为 34.4%，东北地区的镇化指数为 27.3%，说明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过程更多依靠城市化而非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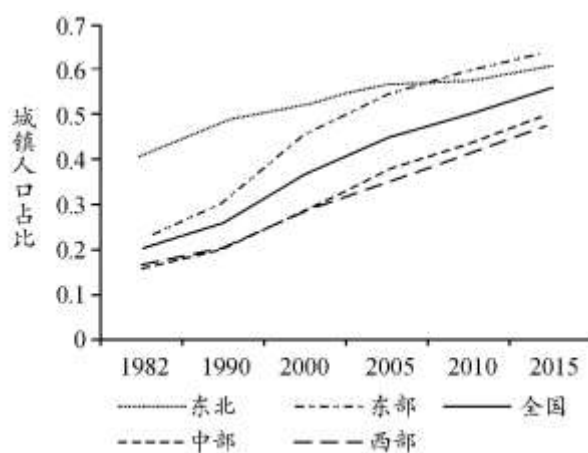


图 3 城镇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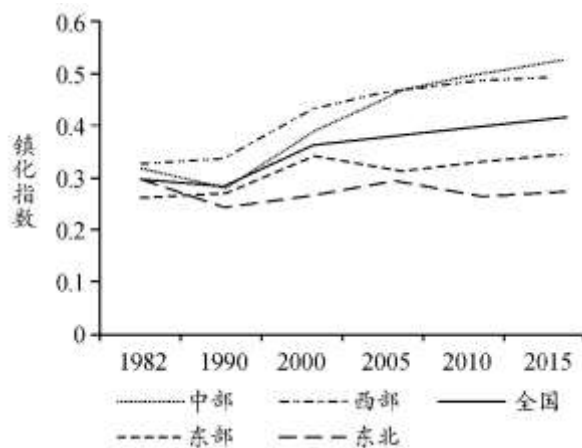


图4 城镇化指数

## 2. 人口“镇化”与人口“城化”的螺旋演变趋势意味着“镇化”与“城化”的关系由协动转为竞争

为了展示省级层面人口城市化和镇化的变动趋势，本文在图5描绘了历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中各省镇区人口比重和城区人口比重的散点图，同时绘制了每个年份的趋势线。分析图5可以发现两点结论：首先，镇区人口比重和城区人口比重整体均随年份的推移不断增长，因此各年份的趋势线在纵坐标方向上不断上升。其次，随着时间推移，镇区人口比重与城市人口比重间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1982~2000年镇化与城市化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2005年二者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010~2015年则为明显的负相关。这种螺旋式的趋势线演变形式说明同一地区范围内镇化和城化由互补逐渐转变为竞争。人口向城区集中较快的省份其镇化速度较慢，而人口向镇区集中较快的省份其城市化速度较慢。这种趋势意味着曾经“农村人口向县镇转移，县镇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模式转变成“转移人口滞留县镇，城市人口转移被截留”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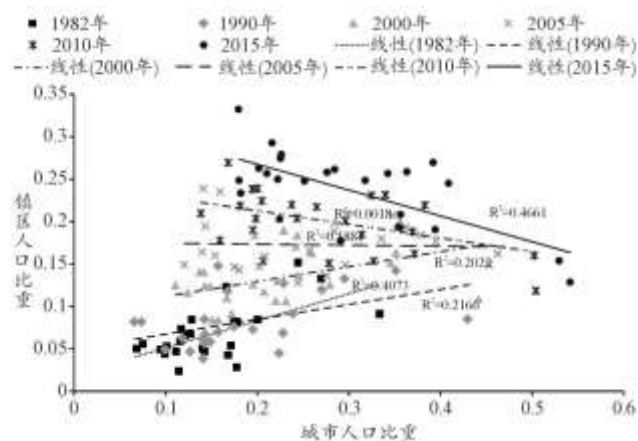


图5 镇化与城化关系演变

为了探究城镇化过程中镇化占比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图6展示了省级层面镇化指数与城镇人口占比间的关系，并绘制了每年的趋势线。1982~2015年，散点在坐标系中的分布位置逐渐由左下角移动到右上角。这意味着整体而言，人口镇化指数和城镇人口占比均随时间逐步上涨。与此同时，人口镇化指数和城镇人口占比间的负向相关关系渐趋明显，即趋势线斜率的绝对值逐渐增大，说明人口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对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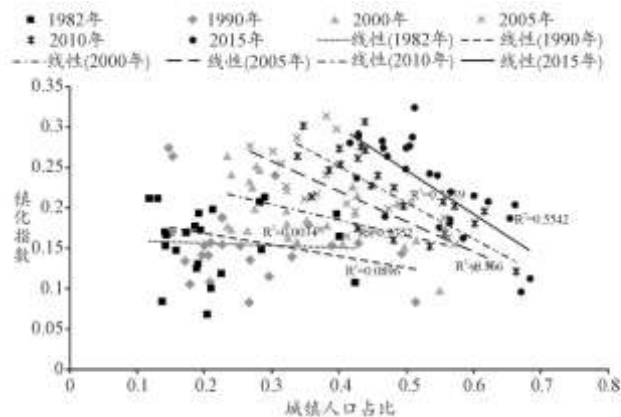


图6 镇化指数与人口城镇化

### 三、城市化与工业化及其协调性的评价体系和测算模型

通过对图1~图6的分析可以发现，将城镇化分为城市化与镇化两部分之后，二者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而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应着力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即重点在于城市化，所以单独探究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及区域差异非常必要。鉴于城市化与镇化之间关系的转变，本文进一步探究镇化与城市化、工业化及二者协调性之间的相关关系演变。

#### 1. 理论框架

第一，既有文献对城市化的度量采用较多的是人口城市化，一般是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sup>[8,9]</sup>或城市人口密度。<sup>[10,11]</sup>也有研究关注土地城市化，<sup>[12]</sup>即建成区用地占比等。笔者认为，对于城市化的考量应当综合上述多方面因素，故在构建城市化评价体系时综合涵盖上述各方面。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情况。第二，工业化不仅体现在工业部门就业占比的扩大，也体现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所以本文在构建工业化评价系统时包括了工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以及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

表1总结了城市化指标体系和工业化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其中城市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人口城市化的城市人口均为人口普查数据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城市常住人口；土地城市化方面，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衡量城市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采用城市道路总面积和医疗机构数量两个指标。工业化评价系统则主要包括第二产业占比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其中第二产业占比包括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产业结构则主要涵盖了非农业产业和农业产业的相对比重，此外还选取了非农业产业与农业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之差以及就业占比之差，以此来反映非农业产业相对于农业的发展程度。

表1 城市化和工业化指标体系

|     | 指标    | 含义     | 计算方法          |
|-----|-------|--------|---------------|
| 城市化 | 人口城市化 | 城市人口比重 | 城市常住人口/总人口    |
|     |       | 城市人口密度 | 城市常住人口/城市占地面积 |

|     |               |              |                     |
|-----|---------------|--------------|---------------------|
|     | 土地城市化         | 城市用地规模       | 城市建成区面积             |
|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 | 道路交通建设       | 城市道路总面积             |
|     |               | 公共服务         | 执业医师数量              |
| 工业化 | 第二产业占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 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
|     |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地区就业总人数    |
|     | 产业结构          |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     |               | 非农产业就业占比     |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
|     |               | 非农产业与农业增加值差额 |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农业增加值占比   |
|     |               | 非农产业与农业就业差额  | 非农产业就业占比-农业就业占比     |

## 2. 相关数据

表 1 中各项指标的测算主要利用了三类数据。一是 1990 年、2000 年以及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二是 1995 年、2005 年和 2015 年的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两类数据主要用于计算城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人口占比的度量。第三类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1 中除城市人口比重外的其他指标测算均根据该年鉴中的数据完成。

为了确保数据间的可比性，城市化和工业化指标的原始数据在进行标准化时，将每一个指标下所有地级市和年份的数据进行统一标准化，因此得到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在地级市之间、省份之间以及年份之间均可比。

## 3. 测算模型

首先，本文基于多指标及熵值法赋权来考察地级市层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其次，本文以多指标体系为基础并利用耦合模型考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状况。

耦合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其特点在于不仅考察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而且还考虑到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避免出现“低水平”耦合。因此，耦合模型多被用来评估经济发展中两个体系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sup>[13~14]</sup>本文在利用熵值法得到城市化与工业化各自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耦合模型测算了中国地级市层面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耦合程度，以考察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在此过程中，“两化”协调度的计算方式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评价系统之间

偏离差系数的单调变换：
$$C = \frac{4}{\frac{[urb * ind]}{[urb + ind]^2}},$$
其中 urb 表示城市化综合水平，ind 表示工业化综合水平。发展度的定义则是用 CD 函数形式刻画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水平： $T = urb^{\theta_1} ind^{\theta_2}$ ，其中  $\theta_1 + \theta_2 = 1$ 。最终耦合度的定义是对“两化”协调度及发展度的综合反映：
$$D = \sqrt{C * T}.$$

## 四、城市化、工业化协调性的时空格局演变

利用前述测算方法，本文首先得到了 1990~2015 年地级市层面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各自的综合水平，并计算其省级层面均值用以分析城镇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互动关系。其次，本文计算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度和综合考虑发展度以后的耦合度，并计

算省级层面均值和标准差，以反映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性的时空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镇化与“两化”协调性的互动关系。

1. “镇化”与城市化综合指数的负向相关性渐趋明显

为了考察镇化与城市化综合水平间的关系，图 7 绘制了各省份人口镇化指数和城市化指数省级均值的散点图及年份趋势线。此处城市化指数省级均值是由熵值法计算得到的地级市城市化水平求平均值得到。可以发现，人口镇化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指数两者之间始终表现为负向相关关系，并且这种趋势渐趋明显。这意味着城市化综合指数较高的地区，其人口镇化水平较低，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发展和镇化发展二者之间并非互补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一规律与图 5 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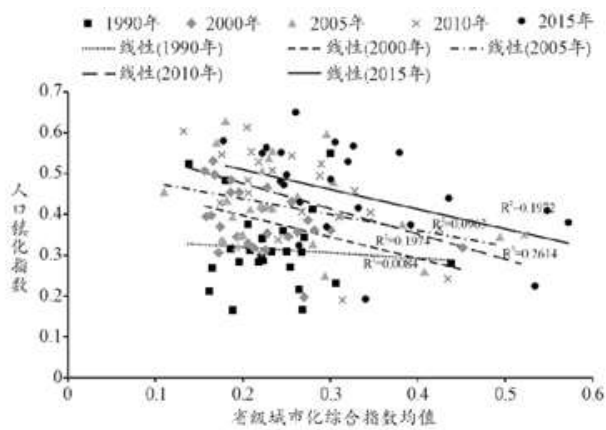


图 7 人口镇化指数和城市化综合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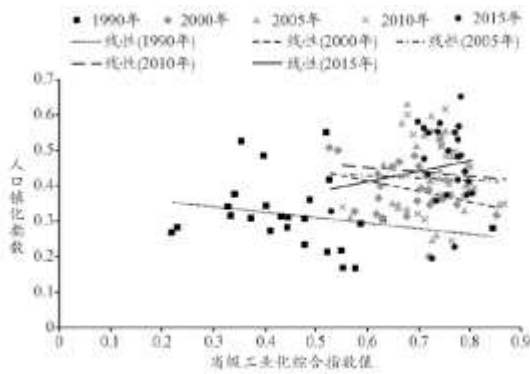


图 8 人口镇化指数和工业化综合指数

2. “镇化”与工业化综合指数相关性渐趋正向，工业化由与城市互动日渐转为与县镇互动

图 8 展示了省级人口镇化指数与工业化综合指数间的相关关系，其中省级工业化指数均值利用熵值法求得的地级市工业化水平计算均值得到。可以发现，人口镇化与工业化间的关系变动趋势和人口镇化与城市化间的关系变动趋势完全不同。1990～2015 年，人口镇化指数与工业化综合指数由负向相关逐步转化为正向相关。这意味着 2000 年以前，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镇化所占比重较小，城市化所占比重较大。而到 2015 年，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镇化所占比重较大。

这说明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由一开始的与城市经济互动为主转变为与镇区经济互动为主。

3. 先降后升、高水平失衡和低水平失衡并存的城市化、工业化协调度演变

协调度实际上反映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偏离程度，分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可知，省份间城市化差异逐步扩大，而工业化差距逐步收敛，因此不同省份间“两化”协调度的差异也在逐步增大。分析图 9 和图 10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1)从时间维度来看，“两化”协调度总体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受 2000 年前后工业化由快转慢和城市化由慢转快的影响，前期工业化发展较快而城市化发展较慢使得“两化”协调度趋于恶化，后期伴随着工业化减速而城市化提速，“两化”协调度逐步改善(如图 9 所示)。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和东北省份由恶化转为改善的时间点为 2000 年；但对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而言，1990~2005 年其协调度均不断下降，2010 年和 2015 年才逐步上升。整体来说，大多数省份 2015 年的协调度均值仍低于 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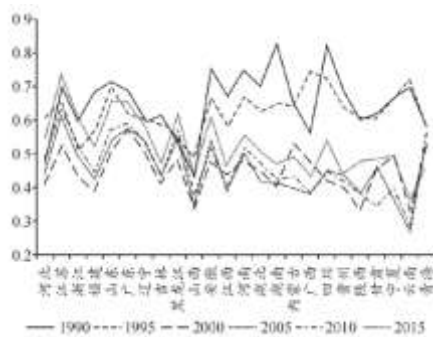


图 9 1990~2015 年省级协调度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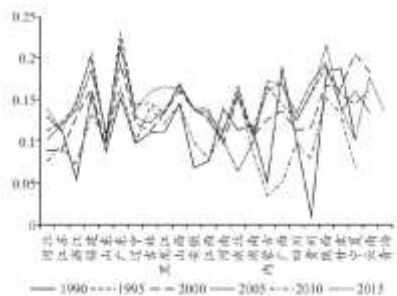


图 10 1990~2015 年省级协调度标准差

(2)从空间维度来看，地区间工业化差异收敛，城市化差异扩大导致“两化”协调度的差异逐渐拉大(如图 9 所示)。城市化增幅较大的东部省份“两化”协调度的上升幅度更快，水平更高；城市化增幅较小的中西部省份则“两化”协调度的上升幅度慢、水平低。

(3)各地区内城市间的“两化”协调度的差异性均有所扩大(如图 10 所示)。由于各地省会及重点城市城市化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因此省内城市间的“两化”协调度差异被拉大。且东部和西部省份城市间的“两化”协调度差异明显大于东北及中部省份。同时，东部省份城市化和工业化综合水平高于其他省份，属于高发展水平上的失衡，西部省份属于低发展水平上的

失衡，而东北和中部省份则属于低发展水平上的均衡。

4. 地区间和地区内差异逐步增大，东部地区显著领先的“两化”耦合度

“两化”耦合度是在协调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包含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耦合度整体表现出上涨趋势，但并不十分稳健，且不同区域间的耦合度差异逐步扩大。分析图 11 和图 12 可得出以下结论：

(1) 从时间维度来讲，受协调度的影响，各地区耦合度均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波动幅度小于协调度(如图 11 所示)。具体而言，各省份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度均值在 2005 年前都出现过下降的情形，且这种情形在中西部和东北省份表现得更为明显。2005 年之后，东部省份耦合度均值不断上升，中西部和东北省份耦合度虽然也表现出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增幅不大，部分西部省份 2015 年耦合度均值水平仍低于 1990 年，该现象主要由于这些省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导致。

(2) 从空间维度来讲，东部省份在高协调度和高发展度的共同作用下，其耦合度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而东北省份耦合度在整体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中西省份耦合度的波动趋势由协调度决定，但波动幅度小于协调度。此外，不同省份间的耦合度均值差异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大。

(3) 东部省份耦合度标准差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且不断上涨。中西省份耦合度标准差偏低，特别是湖南、河南、江西等省份(如图 12 所示)。结合图 11 可知，广东属于高均值高差异类型，说明广东不同地级市间耦合度存在较大差别，且整体均值被省会及个别“两化”耦合度高的地级市拉高，而湖南、江西、广西则属于低均值、低差异类型，说明这些省份内地级市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度普遍偏低，而江苏、浙江则属于高均值低差异类型，说明这两个省份内地级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度普遍偏高，地级市间发展相对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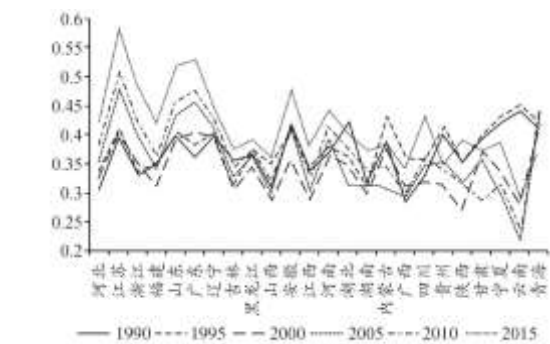


图 11 1990~2015 年省级耦合度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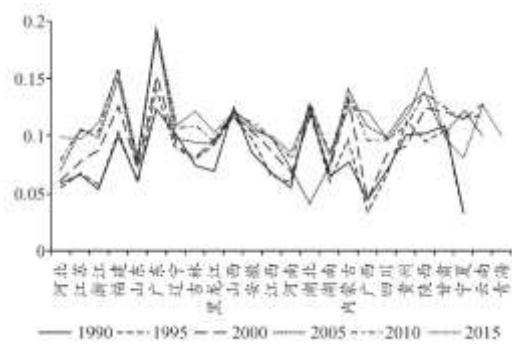


图 12 1990~2015 年省级耦合度标准差

## 5. “镇化”与城市化-工业化耦合度的互动关系渐趋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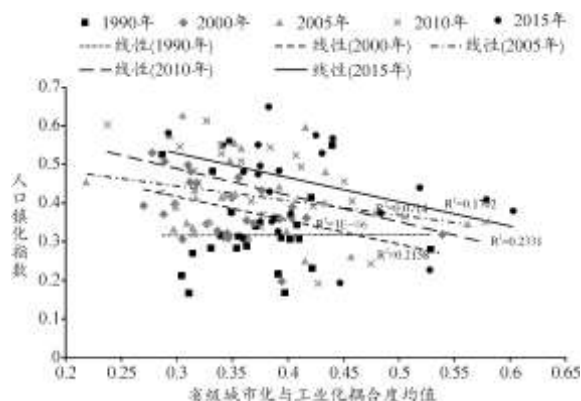


图 13 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城市化-工业化耦合度

图 7 和图 8 展示了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城市化、工业化二者完全不同的相关关系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城市化-工业化耦合度间相关关系的变动(如图 13 所示)。可以发现，人口城镇化指数和“两化”耦合度由最开始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逐步转化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人口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度均值越低。综合分析发现，镇化与城市化始终为负相关，与工业化由负相关逐步转化为正相关，这说明城市化与镇化间存在竞争关系，而工业化后期则与镇化为互补关系，因此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间协调性的下降，此处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指数和“两化”耦合度间有明显的负向相关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动趋势，是由于县镇发展与工业化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加强，而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同级地方政府竞争，使得县镇和城市产生竞争性割裂，无法相互促进，因此随着镇化程度的加深，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变弱。

## 五、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60%，其中城市人口约占 36%，镇区人口约占 24%，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明显滞后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政策规划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发展及其与工业化的协调同步，重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周边中小城镇的带动作用。因此，厘清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化与镇化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性的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明确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短板，为未来城镇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 1. “两化”协调性与“镇化”发展现状

本文构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耦合模型计算了 1990~2015 年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耦合度以反映“两化”协调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镇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两化”协调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

(1)城市化和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双方的演进格局并不一致，且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82~2015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镇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镇化比重达到了 50%左右；东部地区表现为人口城市化略快于人口镇化，镇化比重为 34.4%；东北地区则表现为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镇化，镇化比重为 27.3%。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人口镇化与人口城市化间的关系由协调转向竞争，即二者间的相关关系由正向转为负向，这意味中国城镇化表现出“转移人口滞留县镇，城市人口转

移被截留”的特点。

(2) 地级市城市化与工业化间协调性表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且拐点基本集中于 2000~2005 年，这一点与 2000 年前工业化快速增长，2000 年以后城市化增幅提速相吻合；分地区看，东部省份“两化”协调性显著高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且增速也明显快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从地级市间协调性差异来看，各省份地级市层面标准差均处于上涨趋势，说明各省份内地级市间的差距增大，且这一点在东部省份表现得更为明显。

(3) 综合来看，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渐趋负相关，与工业化综合水平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与“两化”协调性渐趋负相关。这些相关关系表明，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加强，而与城市化日益形成竞争而非互补性关系，因此城镇化渐趋负向地影响双方的协调发展，城市化、城镇化以及工业化三者之间未能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

## 2. 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战略布局方向

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人才的重要依托。因此，为中国城镇化战略布局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非常重要。

(1) 优化城市体系和格局，明确城市化与镇化分工定位，既要促进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又要充分发挥其对周边中小县镇的带动作用。过去城镇化过程中，镇化占较大比重，又由于行政区划分割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等原因，导致城市化与镇化相互割裂，重复建设严重，不利于达到有效的城市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集聚经济。因此，在未来城镇化发展布局中，应引导城市化和镇化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模式。在城市体系中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定位方面，有效的顶层设计有助于城镇间形成差异化发展，而非重复建设。在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联动共享、产业分工协作以及共同市场建设。

(2)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为城市化发展培育新动能。我国城市化显著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缺失产业支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型工业化的有力支撑，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产业转型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具有足够的就业吸纳能力；二是适应全球技术发展，满足绿色环保要求。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需以城市群为载体，提升中心城市在产业链中的龙头作用，通过配套的供地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破解要素制约，增强周边中小城镇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实现城市群中不同城市间的高效互通互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分割，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新型城镇化以城市群为发展主体，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以及县镇之间的良性合作十分必要。因此，需改变政府治理模式，减弱行政分割。只有切实改变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一味追求 GDP 短期目标导致的“以邻为壑”式恶性竞争行为，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资源和要素跨区域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跨区域市场，实现国内大循环。

### 参考文献：

- [1]倪鹏飞，颜银根，张安全. 城市化滞后之谜：基于国际贸易的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2014，(07):107-124
- [2]刘瑞明，石磊. 中国城市化迟滞的所有制基础：理论与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15，(04):107-121.
- [3]肖金成.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农民工问题[J]. 发展研究，2009，(05):18-21.
- [4]秦待见.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作用[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03):96-99.

- 
- [5]许政, 陈钊, 陆铭. 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J]. 世界经济, 2010, (07):144-160.
- [6]陆铭, 向宽虎, 陈钊.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 基于文献的评论[J]. 世界经济, 2011, (06):3-25.
- [7]Fan S, L Li, X Zhang. Challenges of Creating Cities in China:Lessons from a Short-Lived County-to-City Upgrading Polic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 (03):476-491.
- [8]Sato Y, K Yamamoto,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8 (01):45-61.
- [9]Clark G, N Cummins, Urbanization,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in Malthusian England[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 (02):242-247.
- [10]Henderson V, A Kuncoro, M Turn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 (05):1067-1090.
- [11]Carlino G A, S Chatterjee, R M. Hunt. Urba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Inven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 (03):389-419.
- [12]Nunn N, N Qian. 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26 (02):593-650.
- [13]逯进, 周惠民. 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3, (09):3-19.
- [14]张桂文, 孙亚南.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进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 (06):96-106.

#### 注释:

1 图中横坐标均按照东部省份、东北省份、中部省份、西部省份的顺序依次排列。此处为了确保样本间的可比性, 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4 个直辖市;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 不包括海南、新疆、西藏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 根据 2019 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推算。